

中国考古集腋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商周(三)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商周(三)



哈尔滨出版社

1587-53

20122

9

《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者

综 述(一)

孙 海 王 雷 张春霞

综 述(二)

孙 海 贺 平 王 雷

旧石器(一)

孙 海 张春霞

旧石器(二)

孙 海 贺 平

新石器(一)

李晓钟 蔺新建

新石器(二)

蔺新建 李晓钟

商 周(一)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二)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三)

刘 宁 蔺新建

战国秦汉(一)

孙 泓 佺俊岩

战国秦汉(二)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战国秦汉(三)

孙 泓 佺俊岩

魏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魏晋至隋唐(二)

孙 泓 张春霞

宋 辽(一)

姚义田 袁 辉

宋 辽(二)

贺 平 姚义田

金 元(一)

申国俭 刘焕民

金 元(二)

刘焕民 申国俭

明 清(一)

阎中发 贺 平 孙琰琍

明 清(二)

孙 海 阎中发 黎凤春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孙 海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雷 王宏刚 王绵厚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衍 李品清 李之勤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崔 灿 孟广耀 周光培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蒋秀松 魏国忠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泓
校 对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剑 刘 嫻 孙月辉 张晶晶 邹德兰 姜 伟 倪文华 赵锦红
徐 坤 郭妍萍 康欣瑞 黎凤春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侠 王武钰 王绵厚 尹学伟 云希正 田淑华 宁立新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朱德威 刘世枢 刘建忠
苏天钧 张庆捷 张志立 张畅耕 张春霞 李经汉 杨新平 杨富斗
贺 平 赵福生 高 可 阎中发 姚义田 唐云明 黄凤岐 陶富海
韩嘉谷 蔺新建

目 录

侯马附近地区的东周陶器墓	张 辛(1601)
试论楚公逆编钟	李学勤(1619)
论山西出土的青铜戈、矛	李健民(1622)
略谈晋国晚期青铜器动物纹	李夏廷(1631)
从新出土之杨姑壶看杨国	王光尧(1643)
太原金胜车马坑与东周车制散论	渠川福(1646)
从太原赵卿墓出土文物看我国东周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陶正刚(1667)
殷周使用青铜农具之考察	王克林(1670)
河东盐池开发时代考	卫 斯(1675)
“蜚”鼎解	陶正刚(1678)
“虞侯政壶”解	陶正刚(1681)
陈喜壶辨	张 颌(1683)
赵氏戈铭考释	陶正刚(1687)
“羸簋”探解	张 颌(1690)
太原发掘一座春秋大型木椁墓	侯 毅 梁川福(1692)
山西石楼出土龙纹铜觥的装饰艺术与族属问题	刘敦愿(1693)
一座春秋时期大型车马坑在太原重现	程书林(1697)
曲沃发掘晋侯邦父及夫人墓	(1698)
太原市柳子峪有关柳下跖奴隶起义军遗址调查	
.....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太原市文物管理组	(1700)
孝义柳湾煤矿二十九亩地采集的夏时期遗存	宋建忠(1708)
山西孟县东周公由遗址调查	刘有祯(1709)
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文物	卫 斯(1721)
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清理简报	李百勤(1725)
平陆出土一批西周车马器	卫 斯(1731)
山西新绛县古堆、白村遗址调查	田建文 薛新民 杨林中(1732)
晋阳古城勘察记	谢元璐 张 颌(1740)
中条山古铜矿冶遗址初步考察研究	李廷祥(1744)
禹王城地坑式陶窑发掘简报	张童心 黄永久 王在京(1748)
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解希恭(1751)
侯马晋国陶窑遗址勘探与发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1756)
襄汾县大柴二里头文化遗址	高天麟 李健民(1773)
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	陶正刚 刘永生 海金乐(1774)
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	殷玮璋 曹淑琴(1793)
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	张素琳(1803)

侯马下平望墓地发掘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1818)
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	朱 华(1838)
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发掘报告	临汾地区文化局(1865)
万荣庙前东周墓葬发掘收获	杨富斗 田建文 李夏廷(1885)
山西平陆枣园村出土一批西周车马器	卫 斯(1914)
侯马东周文化遗存新发现报导	姚 鉴 李遇春 畅文斋(1916)
侯马西新发现一座古城遗址	杨富斗(1917)
侯马地区古城址的新发现	畅文斋(1919)
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	山西省文管会 侯马工作站(1921)
侯马东周时代烧陶窑址发掘记要	山西省文管会 侯马工作站(1924)
侯马东周殉人墓	畅文斋(1927)
山西侯马东周遗址发现大批陶范	(1931)
山西省侯马发现了春秋时代的釉陶	畅文斋(1932)
侯马东周遗址铸铜陶范花纹所见	张 颌(1933)
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	侯马市考古发掘委员会(1937)
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	王克林(1949)
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简报(1963—1986 年)	吴振禄 滕铭予(1966)
侯马晋国陶窑遗址勘探与发掘	吴振禄 田建文(1987)
山西侯马下平望两座东周墓	范文谦(1993)
1992 年侯马铸铜遗址发掘简报	谢尧亭(2002)
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出土陶器的分期	叶学明(2022)
侯马东周陶范的造型工艺	张万钟(2033)
“侯马盟书”的发现、发掘与整理情况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2039)
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	唐 兰(2046)
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	朱德熙 裘锡圭(2051)
“侯马盟书”注释四种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侯马工作站(2054)
“侯马盟书”丛考	长 甘(2061)
侯马东周社祀遗迹的探讨	王克林(2069)
侯马盟书主要问题辨述	高 智(2075)
侯马呈王东周古城遗址	吴振禄(2079)
侯马上马村两周墓地	吴振禄(2080)
侯马平阳机械厂东周遗址	吉琨璋(2081)
侯马平阳厂东周铸铜遗址	谢尧亭(2082)
侯马下平望东周墓葬	李永敏 谢尧亭(2083)
山西芮城永乐宫新址墓葬清理简报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84)
山西长子县东周墓	陶正刚 李奉山(2088)
太原金胜村 251 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2114)
山西潞城县潞河东周、汉墓	长治市博物馆 晋东南文物工作站(2145)
试论太原金胜村 251 号墓墓主身份	侯 毅(2155)
太原金胜村大墓年代的推定	渠川福(2159)
平鲁井坪楼烦墓	支配勇 高平和(2162)
临猗县程村东周墓发掘简报	张童心 张崇宁(2166)
曲沃曲村发掘晋侯墓地	(2178)
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	(2180)
山西临汾发现灰陶遗址和彩陶时代的农具	畅文斋 张德先(2213)

临猗揭露大批东周车马坑	乔正安(2214)
长治市潞城、黎城、平顺三县调查	宋建忠(2215)
山西平陆发现商代前期遗址	卫 斯(2216)
垣曲县古城南关商代前期城址	佟伟华(2217)
垣曲县古城南关商代前期城址	佟伟华(2218)
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葬	陶正刚(2219)
垣曲县古城南关商代城址	佟伟华(2220)
垣曲县古城南关商代前期城址	沈 勇 袁 虹(2221)
忻州市游邀遗址	卜 工(2222)
垣曲县古城南关商代城址	佟伟华(2223)
洪洞县上院商周遗址	侯 毅(2224)
长子县西南呈西周遗址	宋建忠(2225)
闻喜县上郭村周代青铜挽车	(2226)
临猗县程村东周墓地	赵慧民(2227)
原平县刘庄东周墓	李有成(2228)
闻喜县上郭东周墓地	陶正刚(2229)
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	郭 勇(2230)
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	杨绍舜(2233)
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	石楼县人民文化馆(2238)
山西隰县庞村出土商代青铜器	王 进(2240)
山西永和发现殷代铜器	杨绍舜(2242)
山西屯留县上村出土商代青铜器	侯艮枝(2244)
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	王进先 杨晓宏(2245)
山西洪洞县发现商代遗物	朱 华(2247)
山西石楼义牒会坪发现商代兵器	杨绍舜(2249)
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	杨绍舜(2250)
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	谢青山 杨绍舜(2251)
石楼县发现古代铜器	杨绍禹(2253)
山西右玉县发现青铜簋	右玉县文化馆(2254)
山西长治市拣选、征集的商代青铜器	王进先(2255)
山西洪赵县永凝东堡出土的铜器	解希恭(2260)
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青铜器	阎金铸(2263)
商代龙纹觥	贾文超(2265)
山西省翼城发现殷周铜器	李发旺(2266)
山西翼城发现青铜器	李发旺(2267)
山西芮城柴村出土的西周铜器	戴尊德 刘岱瑜(2268)
山西文水县上贤村发现青铜器	胡振祺(2272)
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	张 颌(2274)
山西省文物商店收进春秋虞侯壶	曾广亮(2276)
山西侯马下平望墓地出土的东周铜器	范文谦(2277)
再谈洪洞坊堆村有字卜骨	李学勤(2279)
洪洞永凝堡西周墓中出土的两种饰物	张素琳(2282)
谈“安阳布”的铸地	陈铁卿(2284)
山西省拣选到珍贵文物——西周铲币	吴连城(2285)
古县岩画又有新发现	津 古 阎雅枚(2287)

关于晋侯鞞组墓的几个问题

孙 华

北赵晋侯墓地是一处从西周中期开始至春秋初期的晋侯专用墓地,墓地内共埋葬了八位晋侯及九位晋侯夫人。这些墓葬一般均为两两并穴成组的夫妇合葬墓(仅一组为一侯二夫人),基本分作南北两排排列(仅一组墓介于南、北两排之间)。各组墓葬的先后次第从墓地北排东端的 M9、M13 组起,由东向西依次为 M6、M7 组和 M32、M33 组,然后为介于北排和南排之间的 M91、M92 组,其后又折转回南排东端的 M1、M2 组,再为由西向东排列的 M8、M31 组和 M64、M62、M63 组,最后是北排西端的 M93、M102 组^①。我们所说的晋侯鞞组墓即该墓地编号为 I 12M1、I 12M2 的两座并穴夫妻合葬墓(下简称 M1、M2)。该组墓位于墓地南排的东端,M1 居东,M2 居西,在 M1 东侧还有长方形车马坑 1 座。从出土器物及人骨特征分析,M1 墓主为男性,M2 墓主为女性,两墓的相对位置与北赵晋侯墓地其他各组(M9、M13 组除外)相同^②,即男东(左)女西(右),晋侯墓邻近车马坑。遗憾的是这组重要的晋侯墓被盗,不少铜器和玉石器流散到香港、台湾和日本。由于晋侯鞞组墓是北赵晋侯墓地中发掘最早的一组,墓葬发掘及报告编写之时,同墓地其他保存完好的晋侯墓和晋侯夫人墓尚未发掘,散失在外和被上海博物馆收购回的铜器尚未刊布,缺乏对比材料,因此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写的《1992 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下简称《报告》)只笼统地推测该组的“墓主应该是晋国诸侯一级的贵族”,对个别出土器物的用途也未作具体的推断^③。下面,笔者根据新刊布的材料对晋侯鞞组的几个问题略作探讨,以求对该组被严重盗扰的晋侯墓的原貌有一个大体完整的认识。

(一)晋侯鞞是哪一代晋侯

晋侯鞞组墓已被完全盗扰,发掘整理者刘绪、徐天进根据 M1、M2 中清理的铜盨残组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回的晋侯鞞盨组形制相同,且晋侯鞞盨有缺盖组的情况,提出了晋侯鞞盨可能出自该组墓,该组墓的墓主可能为晋侯鞞和晋侯鞞夫人的推测^④。《报告》发表以后,上海博物馆马承源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报告》中“M2 出土器物图四二之 4 铜盖组,其形式和晋侯鞞盨的盖组完全相同,上海博物馆三盨中,有盨盖组不全,所发掘残件当是此盨的劫余物”^⑤。李伯谦在述及流入日本的一件晋侯鞞盨时,也根据“M1、M2 组出土的铜盨碎片中,有与其花纹相似者”,认为那件铜盨“有可能是由 M1、M2 组墓中盗出”^⑥。这些意见应当都是正确的。晋侯鞞盨现在知道的共 7 件,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 2 组(详见后)。而在 M1 出土器物中,有被《报告》称之为“容器腹片”的铜器残件一块,其外表饰夔龙纹,内有“……月初吉……作宝尊……年子子子孙孙永宝……”的铭文,从器表花纹与器内铭文的位置关系看,它正是一件铜盨盖顶的残片,其文字也与椭圆形组晋侯鞞盨铭文的中段相似。晋侯鞞盨无疑应分别出自北赵晋侯墓地的 M1 和 M2,这两座墓应当与晋侯鞞和晋侯鞞夫人有关。

晋侯鞞在文献记载的晋侯名字中不见,马承源根据铜盨年代和对晋侯鞞的鞞字所从“幸”或音“福”的考证,认为就是文献中的晋厉侯福^⑦。马先生的意见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邹衡师在《论早期晋都》一文中就认为鞞、福二字是通假字,并迳将晋侯鞞写作晋侯福^⑧。

然而,将晋侯鞞之“鞞”读作“福”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首先,正如裘锡圭已指出的,“在《集

韵》入声屋韵方六切‘福’小韵中,实际上是只有‘羹’字而没有‘𦣻’字。‘𦣻’既无‘福’音,读孰为‘福’之说就不能成立了”^⑩。其次,马先生将僕、𨔵、𨔶、𨔷等字归为“都从𦣻得声”的字,也与《说文》不符,《说文》的羹、𦣻分别是不同的部首,对字属𦣻部,僕字属僕部,至于𨔵、𨔶、𨔷在《说文》中分别是“从木羹声”、“从车羹声”和“从土羹声”,它们均为从羹得声的字而不是从𦣻得声的字。至于西周金文中对字左边偏旁多从土、写成“孰”形较少的问题,这可能与时代风气有关。金文中对字作“孰”者如《盩厔尊铭》、《柞钟铭》,其年代都在西周中晚期,这与晋侯孰诸器时代相当。孰应是这时出现的对字的一种写法。“把𦣻读为‘福’,力主二者不是一个字。这是比较勉强的”^⑪。

裘锡圭释孰为对,由于在史籍所载晋侯名字中无名对者,故裘先生认为,“晋侯对的‘对’也是字而不是名。可能以‘对’为字的晋侯有两位。即厉侯福和靖侯宜臼”^⑫。

笔者赞同裘先生释孰为对以及从对与文献记载中晋侯名字意义的联系上去推求晋侯对属哪一代晋侯的意见。不过,在裘先生认为可能属于晋侯孰的两位晋侯中,笔者更倾向于晋靖侯宜臼。因为从晋侯孰组墓与该墓地其他组晋侯墓的位置排列关系和年代来看,把晋侯孰墓当作晋靖侯宜臼墓要比当作晋厉侯福墓合理。

北赵晋侯墓地诸组晋侯墓的排列顺序如前面所提到的,是北排早南排晚,每排中又是东侧的墓组早西侧的墓组晚^⑬。晋侯孰组墓的位置,按晋侯墓地诸组晋侯墓葬的排列次序,属于第五组墓葬,在它的前面还有四组晋侯墓^⑭。其中最早一组晋侯墓(M9、M13)的年代,原简报定为“穆王前后”^⑮,从该组墓出土器物与陕西长安普渡村“长凶墓”非常相近来看^⑯,该组墓也不能早于长凶盃的年代上限穆王时期,其年代范围如果更确切地加以限定的话,应该断定在穆、恭之际^⑰。假设晋侯孰墓为厉侯福墓的话,那么比晋侯孰墓早的四组墓葬的晋侯,按照《史记·晋世家》的晋侯世次,上推厉侯前面的四位晋侯,即M91、M92组为成侯服人,M33、M32组为武侯宁族,M6、M7组为晋侯燮父,M9、M13组为唐叔虞。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唐叔虞是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为晋国始祖;而M9、M13组的年代已在穆、恭之际前后,除非唐叔虞的在位年代长达成、康、昭、穆四代,否

则二者的年代就不能吻合。成、康、昭、穆四王在位年数,研究者意见分歧较大,多者达169年(吴其昌说)^⑱,少者也有97年(陈梦家说)^⑲。唐叔虞的在位年代是不可能如此长久的。而假设将晋侯孰定为靖侯宜臼的话,那么前面四组墓葬的晋侯就分别是:M91、M92组厉侯福,M33、M32组成侯服人,M6、M7组武侯宁族,M9、M13组晋侯燮父(从晚到早)。最早的晋侯燮父的卒年是有可能到北赵晋侯墓地最早一组墓(M9、M13)的年代范围即穆、恭之际的。据此,我们可以判定,晋侯孰即晋靖侯宜臼的说法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晋侯孰组墓与墓地南排其他组晋侯墓的关系来看,将晋侯孰当作靖侯宜臼也比当作厉侯福适宜。在晋侯孰组墓西侧,紧邻的是稍晚的晋侯穰/断组墓(M8、M31)。晋侯穰,其名字与文献记载中的晋献侯名(苏)相同,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就是晋献侯^⑳;邹衡师则根据M8出土晋侯穰钟“唯王三十又三年”的铭文与《史记·晋世家》所记晋献侯的在位年代不合而合于晋穆侯的在位年代,从而推断“晋侯苏决不可能是晋献侯,当为晋穆侯无疑”^㉑。晋侯断不见于文献记载,他相当于文献中的哪一位晋侯,研究者意见不一。李朝远和张颌认为是晋文侯仇^㉒,裘锡圭认为断字应读为“斯”,是晋献侯苏之字^㉓,笔者却怀疑他是晋釐侯司徒^㉔。不过,无论是根据哪一种意见,晋侯穰/断组墓的晋侯不可能是晋献侯苏以前诸位晋侯则是可以肯定的。按照《史记·晋世家》等文献的记载,晋献侯苏前后诸位晋侯的世次是:厉侯福→(子)靖侯宜臼→(子)釐侯司徒→(子)献侯籍(苏)→(子)穆侯费王。如果以晋侯穰/断为晋献侯苏之墓,那么,比晋侯穰/断墓略早且彼此紧邻的晋侯孰墓,必然只可能是晋献侯苏之父晋釐侯司徒和晋献侯之祖父晋靖侯中的一个(前者按父子关系排定墓位,后者按昭穆关系排定墓位),而不大可能是晋献侯苏的曾祖父晋厉侯福。因为如果将晋侯孰推定为厉侯福的话,厉侯福墓与献侯苏墓间就缺少了两代晋侯,这就使北赵晋侯墓地的排列布局关系很难解释。将晋侯孰解释作厉侯福显然不如解释作靖侯宜臼合理。

(二)晋侯孰组墓铜礼器组合的推测

晋侯孰组墓被盗严重,铜礼器几乎被洗劫一空,晋侯孰墓仅余铜盃残片一块,晋侯孰夫人墓只剩无铭残铜鼎一件。另外曲沃县公安局收缴的一

件铜鼎,据《报告》推测,也可能出自晋侯鞞墓。只根据发掘材料,晋侯鞞及其夫人墓原先的铜礼器组合规格已经不清。不过,从目前已知的被盗出土的晋侯鞞铜器,我们还是可以对其铜礼器的基本组合作一个大概的估计。

马承源在《晋侯鞞》一文记述在香港见到和上海博物馆购回的晋侯鞞说:“晋侯鞞发现两组六器,收归四器。第一组,长方形盨,陆续发现四器,收归三器;第二组,椭圆形盨,发现两器,收归一器,另一器铭文已基本损坏。”第一组铜盨铭文共30字:“唯正月初吉庚寅,晋侯鞞作宝尊及盨,其用田狩,湛乐于原隰,其万年永宝用。”第二组铜盨铭文共24字(包括重文2):“唯正月初吉丁亥,晋侯鞞作宝尊盨,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③这两组6件晋侯鞞并不是晋侯鞞组墓被盗出土的全部铜盨,李伯谦在日本见到的一件晋侯鞞,其铭文共23字(含重文2):“唯正月初吉丁亥,晋侯鞞作宝盨,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④铭文格式及器形同马承源所说的第二组晋侯鞞,文字也只少一“尊”字,显然它与第二组晋侯鞞为一组列盨。流入日本的这件晋侯鞞不可能是马承源在香港见到的那件没有收归的晋侯鞞,因为香港那件为长方形,铭文已基本损坏;而日本这件为椭圆形,铭文基本完整。尚存香港的那件晋侯鞞残盨与北赵晋侯鞞墓(M1)出土的有铭铜盨残片也不是一件,因为前者属第一组长方形盨,铭文排列为五行30字,而后者铭文仅为三行,与第二组椭圆形晋侯鞞相同。这样,全部的晋侯鞞应该有8件,其中第一组和第二组各4件。根据晋侯鞞墓出土有与第二组晋侯鞞相同铭文的铜盨残片,可以断定,第一组晋侯鞞应为晋侯鞞夫人墓所者,而第二组晋侯鞞则为晋侯鞞墓所有。

盨是由敛口簋分化出来的新器种,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⑤。盨由簋演变而来,用途又与簋相同,故也有盨自名为簋或盨簋^⑥。晋侯鞞墓及夫人墓未见有随葬铜簋的迹象,而所出铜盨数量又分别与北赵晋侯墓地其他晋侯墓和部分晋侯夫人墓出土铜簋数量相同^⑦,所以该组墓应是用铜盨取代了簋,它们应都是随葬四盨(簋)这一等级的墓葬。

列簋在周文化铜礼器中是与列鼎配合使用的最主要的礼器。作为取代列簋作用的“列盨”,它们也必与列鼎相配合。晋侯鞞墓和夫人墓仅遗留有

铜鼎各一件,这两件铜鼎均未见有铭文;但据马承源说,与晋侯鞞同时发现的还有晋侯鞞鼎(鼎的数量马先生未说明,估计只有1件)。由此可知,晋侯鞞组墓的两套列鼎很可能是由有铭铜鼎和无铭铜鼎拚凑的,其他出自晋侯鞞组墓的无铭铜鼎已不为人们所知晓。依周文化铜礼器的组合规律,与取代簋作用的四盨相配的铜鼎,其数应为5件^⑧。在北赵晋侯墓地属于西周后期的南排墓葬中,保存完好的晋侯邦父墓(M64)为五鼎四簋^⑨,三座晋侯夫人墓中有两座为三鼎二簋(M31、M63),一座为三鼎四簋(M62)^⑩。因此,晋侯鞞墓的铜礼器规格应当为五鼎四簋,晋侯鞞夫人墓则应为五鼎四盨或三鼎四盨,而以三鼎四盨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笔者目前已掌握的信息,流失在外和已收归国内博物馆的属于晋侯鞞组墓的铜器至少还有一簋一盘一匜。晋侯鞞簋现在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新近入藏,器内有铭文23字^⑪。晋侯鞞盘现在日本,盘内有铭文20字:“唯九月既望戊寅,晋侯鞞作宝盘,其子孙万年永宝。”^⑫晋侯鞞匜现藏上海博物馆,材料尚未公布,估计其铭文与晋侯鞞盘类似,为配套的铜器。除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来源与晋侯鞞簋相同的两件标明为晋侯作的铜鬲,很可能也属于晋侯鞞墓。根据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形成的礼器制度,并参照北赵晋侯墓地其他保存完好的晋侯墓均有铜甗一件,晋侯及君夫人墓分别有铜壶一对(2件)的情况,晋侯鞞墓还应有铜甗一和铜壶二,晋侯鞞夫人墓还应有铜壶二件。按照先秦礼书的记载,国君和大夫有钟、磬一类乐器^⑬,晋侯鞞墓出土有石编磬,编磬是与编钟相配的乐器,晋侯鞞墓也就与其他晋侯墓一样随葬有铜编钟一套(8件)。据此,我们可以大致复原晋侯鞞组墓铜礼器群的基本组合如下:

晋侯鞞墓(M1):鼎5、盨4、鬲1、簋1、甗1(?)、壶2、盘1、匜1、编钟8等。

晋侯鞞夫人墓(M2):鼎3、盨4、鬲1、簋1(?)、壶2、盘1、匜1等。

根据上述对晋侯鞞及夫人墓基本铜器组合的分析,我们认为与该墓地其他晋侯墓一样,其用鼎制度属于少牢五鼎之制。其规格为卿大夫或下大夫的等级^⑭。晋为周王朝的同姓诸侯,春秋时期又为五霸之一,其用鼎制度却仅为卿大夫或下大夫的规格,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理解。然而,如果我们全面考察周代的分封制度及等级制度,结合考

察晋国从甸服小国演变为大国霸主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西周时期的晋侯使用少牢五鼎正合当时的制度。

晋国虽为周之同姓诸侯,但其始封的等级甚低,仅为甸服偏侯,所以《左传·桓公二年》记晋大夫师服说:“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也,其能久乎?”《国语·晋语一》也说:“今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虽欲纵惑,未获专也。”所谓甸服小国,按郑国子产的说法,是“爵卑而贡重”。爵位卑下的晋国国君使用少牢五鼎是不奇怪的。西周时期晋为甸侯小国,在晋文侯有功于平王东迁而受“文侯之命”,以及晋文公诛乱勤王而受赐命以前,晋君侯使用少牢五鼎的相当于周王室大夫的用鼎制度,这正是晋侯恪守周人礼法的反映。

(三)晋侯鞞组墓残存器物反映的问题

1. 葬具装饰

晋侯鞞及夫人墓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鱼和石鱼。据《报告》,晋侯鞞墓(M1)出土铜鱼42、石鱼48件,它们都“出于椁内四周”;晋侯鞞夫人墓(M2)出土铜鱼36、石鱼14件。这些铜鱼和石鱼,从它们的出土位置并对照历史文献记载,它们应当是饰棺“柳”、“荒”、“池”下悬缀之物。此外在晋侯鞞夫人墓中,还残留有“大石圭”的残件,石圭前部已失,两侧有刃与戈相似,从它“质较粗,磨制粗糙”来看,很可能也是饰棺“翬”上戴的圭。

棺外覆以“墙”、“帷”、“柳”、“荒”构成的屋形棺罩,墙帷外设置名为“翬”的扇形装饰,按照文献记载,为周人的葬俗。《礼记·檀弓上》说:“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埴周,殷人棺槨,周人墙置翬。”所谓“周人墙置翬”,是举饰棺之具的墙、翬为例,说明“周人又为饰棺之具,盖弥文矣”^⑤。关于周饰棺之具的情况,文献中以《礼记·丧大记》记述最具体,唐人孔颖达对于这段文字的解释也颇周详,研究周人饰棺一般都是以这条文献作为最主要的材料。根据这条文献,周人王以下饰棺之具可分为三等:诸侯一级饰棺为“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加伪(帷)荒,纁纽六,齐,五采五贝。黼翬二,黻翬二,画翬二,皆戴圭。鱼跃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一级饰棺为“画帷,二池,不振容。画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纁纽二,玄纽二。齐,三采三贝。黻翬二,画翬二,皆戴纁。鱼跃拂池。大夫,戴前纁后玄,披亦如之”。士一级饰棺为“布帷,布荒。一池,揄绞。纁纽二,缁

纽二,齐,三采三贝,画翬二,皆戴纁。士,戴前纁后缁,二披用缁”。至于周王饰棺之具,《丧大记》虽未述及,但从孔颖达疏“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礼记·礼器》“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翬”,以及《丧大记》所述君、大夫、士三等饰棺之具数目的等差推测,应该为四池,齐七采七贝,八纽,八戴,八披,外加八翬。一般认为,《礼记·丧大记》所记周人饰棺制度是晚周新制而非西周古制。然而,正如沈文倬所指出的,商周礼典重在实行,在当时很可能有不成文的礼法^⑥,其记录成文的年代尽管较晚,但这些记录反映的内容却很古老。考古材料所见周人饰棺之具颇为切合礼书所记制度,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周人饰棺之具主要是由作为框架的木竹和蒙缀其上的纺织品构成。木、竹和纺织品容易朽烂,很难保存到现在,我们在考古材料中见到的主要是棺罩上串缀的海贝和池下悬缀的铜、石质的鱼,以及夹峙棺罩两旁的翬上安装的石圭。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周人饰棺在西周早期就已存在,不过直到西周中期前段,周人馆棺之具似乎尚未形成如同《礼记·丧大记》记载的饰棺制度,所以在属于这一时期的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诸井叔墓(如M157)、宝鸡强国墓地诸强伯墓^⑦、以及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诸晋侯及夫人墓(如M9、M13、M6、M7)中,我们只见有成串海贝联缀的棺饰,未见用作饰棺的铜鱼、石鱼和石圭。周人饰棺形成国君棺罩池下悬鱼、墙外立戴圭之翬这样的制度,很可能已在西周中期后段即懿、孝之际以后;所以我们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君一级的墓葬(如M2001)以及北赵晋侯墓地西周中期后段的晋侯墓(如M32)和西周后期诸晋侯及夫人墓(如M8)中,我们均见有散布于棺外侧畔的铜鱼和石圭^⑧。晋侯鞞及其夫人墓的年代,原《报告》“定在西周晚期”,如果从该组墓墓主的角度考察,其年代范围不过夷、厉时期。这时的晋侯及其夫人墓使用悬挂铜鱼的棺罩和戴石圭的翬作为棺饰,不仅是当时葬礼和时尚的反映,同时也是与其国君和君夫人的身份基本吻合的。

晋侯鞞墓(M1)饰棺的铜鱼和石鱼,原《报告》说“出自椁内四周”。鱼是悬于池下的饰件,如此说来,晋侯鞞墓似乎用了四池的棺罩。按照先秦礼书记载的周人饰棺之制,“君三池”、“大夫二池”,四

池为天子之制。西周时的晋侯为甸服小国之君,按礼制应使用三池甚至二池的棺罩才符合制度。不过,晋侯匭墓椁室已被盗扰,“未扰动的器物仅陶鬲一件,位于北侧填土中,其余多为残件,大部分出自椁内盗洞中。”现在散布在椁内四周的铜鱼和石鱼很可能已非原先位置,不宜据此认为晋侯匭墓使用了超越晋侯身份等级的四池棺饰。

2. 缀玉覆面

晋侯匭夫人墓(M2)出有长条形玉饰一件,形态为一端上钩,一端上翘,中央上缘有尖状凸起,周边及中部有刻纹,另有《报告》称作“玉鸟”的玉饰1件,形状近似扇形,上部有穿孔,下部如翼外展,并开有三角形小缺口两个。以上两件玉饰,从其形制特点并对照现已发现的西周葬玉材料,它们应为缀玉覆面的组成部分,其中前者应为覆面上组成人面的玉饰件中的眉,后者应是覆面方巾四周的缀。

覆面在先秦称“幘目”,它是一块盖在死者脸上的表黑里红的方形布帛。《仪礼·士丧礼》说:“幘目用缁,方尺二寸,衿里,著组系。”郑玄注:“幘目,覆面者也。”覆面的主体是用纺织品缝制,难以保存下来,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覆面材料,只有缀玉覆面所缝缀的玉石装饰了。

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缀玉覆面都是用玉石片琢磨成象征人的眉、眼、鼻、耳、嘴等形状,然后按人面模样,缝缀在方形布帛上而成。目前见到最早的一具缀玉覆面出自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的M157井叔墓,时代在西周懿、孝之际^④。此后,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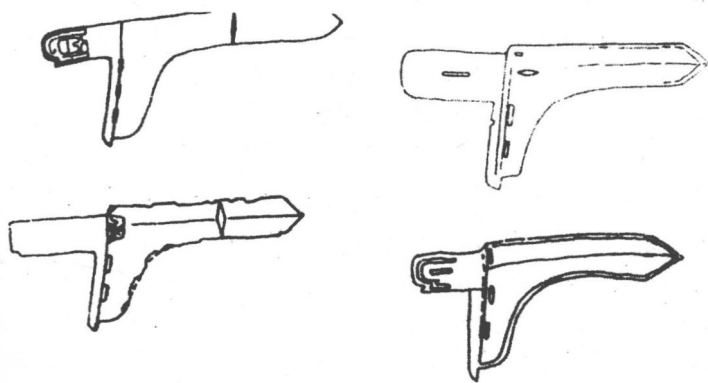
西周中晚期的长安张家坡 M303 号墓^⑤,北赵晋侯墓地西周晚期诸晋侯及夫人墓、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西周晚期的 M2001 虢君墓,以及洛阳中州路战国早期的 1316 号墓都出土过^⑥。显然,缀玉覆面的出现时间很可能应在西周中期的懿、孝之际前后,并在西周晚期及东周时期成为一种流行的殓具。

关于周人缀玉覆面的使用情况,先秦文献未见记载,但分析上述周代缀玉覆面考古材料,可知这种覆面主要出土于周人高级贵族的墓葬中。如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其墓主井叔为周王室卿大夫一级重臣^⑦;北赵晋侯墓地诸出土缀玉覆面的墓葬,其墓主皆为诸侯国君及君夫人;而在众多的周代中小型墓葬中,我们却罕见有以缀玉覆面为殓具的例子。由此推测,覆面是否缀玉当是周人区分等级高下的制度之一,缀玉覆面乃王室卿大夫或诸侯国国君以上的贵族才能使用的殓具,低级贵族和国人是不得使用的。

3. 三角形锋中胡戈

晋侯匭墓(M1)出土铜戈3件,其中M1:025为长援直内中胡戈,援末呈三角形,援中起脊,本部近栏处有虎形翼,胡上二穿。M1:024援部已残,形制与前一件基本相同,只是援本无虎形翼,胡上多一穿。这两件铜戈,其年代不晚于晋侯匭墓的年代,即西周夷厉时期。它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明确的三角形锋戈的最早一例,可视为该类铜戈的标准器之一。

三角形锋中胡戈一般认为出现较晚。马承源在论破口山铜器群的年代时,就曾将三角形锋中胡戈作为该铜器群年代在春秋中期的一个重要证据。马先生说:“戈的三角形前锋,以春秋时代为多。初形的如上村岭虢国墓地虢太子元徒戈。”^⑧李学勤也认为,破口山铜器群,即使以中原青铜器的序列作为判断年代的标尺,也能看出这批青铜器早不到西周。例如“戈,三穿中胡,三角锋,援上下刃均下曲,内有缺及小刺”^⑨。笔者认为,破口山铜器群,的确如马、李等先生所论,其年代不像原先认识的那么早;但用戈的前锋为三角形、戈内尾端下有缺及小刺等来作证据,却似乎并不合适。戈内尾端圆和且下有小刺,这在西周早期的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公族墓葬中就已出现(如



图一 三角援戈

上1:辛村 M60:29+32 上2:虢太子墓出土
下1:晋侯匭墓 M1:025 下2:破口山出土

M60:29+32);而三角锋的中胡三穿戈,其出现年代至迟也在西周中晚期之际或西周中期后段,晋侯甹墓的三角形锋中胡戈即其例证。

责任编辑 于炳文

注:

- ①④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1期。
- ② 北赵晋侯墓地的M9、M13组无车马坑,殉车均放于墓道及墓室内,故其布局与其他各组不同。参看①。
- ③ 参见《文物》1993年3期。
- ④ 刘绪曾将M2的罍组绘图寄给上海博物馆的一位朋友,请他对照缺钮的晋侯甹罍,看是否为该罍的残件。
- ⑤⑦②④ 马承源:《晋侯甹罍》,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编辑《第二届国际中国文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
- ⑥②③③ 李伯谦:《晋国始封地考略》,《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2日第3版。
- ⑧②④ 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1期。
- ⑨⑩⑪⑫⑬ 裘锡圭《关于晋侯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2期。
- ⑭ 北赵晋侯墓地诸组晋侯墓的先后次第,无论从墓葬形制、积炭与否、殉车情况还是随葬器物,都明显呈现从北排东端开始至北排西端终结的演变轨迹。只是由于晋侯墓地这些材料大多尚未发表,我们这里不便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的论证,不过从已公布的积石积炭这一方面的材料,也足以说明晋侯墓地排列次序这个对于判断晋侯甹组墓至关重要的问题。北赵晋侯墓地北排最东的M9、M13组,墓室无木炭;稍西的M6、M7组,其东侧的M6情况同M9、M13组,西侧的M7椁室下面就已有一层薄薄的木炭;再西的M32、M33组,木炭已不仅铺在椁下墓底,椁室周围也有了木炭。墓地南排诸墓,最东端的M1、M2组,木炭包裹椁室,但椁下尚不铺砌石块;其西侧的M8、M31组以及M64、M62、M63组,不仅椁室均包以厚厚的木炭(仅M62除外),而且椁下多垒砌石块或漫铺石块,可视为积石的冢形。根据周墓从无积炭到有积炭、再到积炭积石的演变规律,北赵晋侯墓地诸组晋侯墓的排列顺序显然应是“先启用墓地北部,由东向西依次排列,然后再转向墓地南部,由东向西依次排列”(注①简报语)。
- ⑮ 天马——曲村遗址考古队:《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三晋考古》第一辑。
- ⑯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晋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 ⑰ M9、M13组的M13,其最大一件铜鼎形制为立耳,束颈,鼓腹,兽首矮柱足,其形态与长白盃的002号鼎非常相似。该墓其他器物也与长白盃颇为相像。长白盃出土有长白盃,其铭文有“唯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或应。穆王……”的记述,故一般都将此器王世定为穆王,将长白盃铜器群作为穆王时期的标准器群。不过,长白盃铭文中“有井伯”,此人在被认为是恭王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常

见,故有学者将井伯定为穆、恭间人,将长白盃的年代推定在穆王末年(参看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五377页,中华书局,1986年)。以长白盃铭文记有穆王册命长白事而将该盃定为穆王时器,这是基于多数学者主张的“西周王号生称说”所作的推断,如果依据部分学者所持的“西周王号死谥说”,长白盃也有属于穆王之后的恭王时期的可能。

- ⑰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商务印书馆,1936年。
- ⑱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再版。
- ⑲ 李伯谦:《晋国始封地考略》,《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2日第3版;裘锡圭《关于晋侯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2期。
- ⑳ 李朝远:《晋侯斂方座簋铭管见》,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编辑《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张颌:《晋侯斂簋铭文初识》,《文物》1993年1期。
- ㉑ 关于晋侯斂即晋僖侯司徒的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此不赘述。
- ㉒ 铜罍,一般认为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参看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但根据新的考古材料,铜罍的出现应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北赵晋侯墓地年代在穆、恭之际的M13,就已有铜罍出土。
- ㉓ 参看(日)林已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下册151—156页,吉川弘文馆。
- ㉔①① 曲沃发掘晋侯邦父及夫人墓》,《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30日第1版。
- ㉕①① 参看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1、2期。
- ㉖ 晋侯邦父墓材料来源同注②③。除晋侯邦父墓外,晋侯殳/斂墓(M8)的复原礼器组合也为5鼎4簋。
- ㉗ 《礼记·丧大记》:“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撤悬,士去琴瑟。”
- ㉘ 陈澧:《礼记集说》语。
- ㉙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15、16辑,中华书局1981、1982年。
- ㉚①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期;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 ㉛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3期;参见注③文。
- ㉜①① 张长寿:《西周的葬玉——1983~1986年沔西发掘资料之八》,《文物》1993年9期。
- ㉝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㉞ 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㉟ 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5期。

从太原赵卿墓出土文物看 我国东周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陶正刚

1988年5月在山西省太原市南郊金胜村第一发电厂扩建工程中发现和发掘了距今2500余年前的春秋晋国赵卿墓。出土文物达30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精品有我国春秋时期最大的饔鼎,标志墓主人身份7、6、5件组套的三组升鼎,大型莲瓣盖方壶,蟠螭纹鉴,高浮雕夔纹罍,形同鸷鸟、羽毛丰满的鸟尊,犹似天上匏瓜星座的匏壶,精美的鹤纹高柄小方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虎形灶,蟠螭纹毡帐顶等,精品达130余件。均属国家级文物珍品。在这批晋式青铜礼器中有一组与众不同相合拍的出土文物,主要有毡帐顶(也称之部落)、扁形背水壶和高圈足杯(形同饔)、虎形灶等。毡帐顶由盖顶和圆釜两部分组成,盖顶端圆鼓,周围较厚,凸出10个左右圆弧形纽,每个小组上面都套有一个鸭头形扣,用于安装架置毡帐时拴挂绳索用,下接圆弧形釜,釜上面饰有蟠螭纹毡帐顶似今日蒙古草原上牧民架置活动帐房的部件。背水扁壶,长方形口,直口直领、弧肩圆腹,内收成平底,肩部有一对对称环形耳,下腹部有一个环形耳,素面。在工具类中还有五件小型的高圈足杯,厚唇、直口直腹壁、圜底、高喇叭形圈足,同北方草原上常见饔,口沿上有双立耳和无耳两种。

毡帐顶、双耳扁壶和高圈足杯都是常见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是北方游牧部族人民最喜欢使用的生活用具。毡帐顶时至今日在我国仅发现有五件,1974年河北平山县接驾村中山国中山王墓

中出土两件,1954年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一件,1984年原平东社乡王北尧村征集一件,和太原赵卿墓一件。众所周知,平山中山王国属狄人建立国家,原平东乡也属于戎狄族出土物。长治分水岭曾是赵国的领地,太原、长治均属赵氏家族所有。背水壶是骑马出行时系带水的生活用具。高圈足杯,在晋国中期闻喜上郭村春秋墓中曾出土过一件大型同类型高足杯(饔),但在晋式青铜器中实属罕见。在赵卿墓中器形小。饶有兴趣的是,这种高圈足杯,在内蒙到西伯利亚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中是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铜(铁)饔。根据田广金先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论证饔最早见于西周晚期,一直延用到东汉时期。^①虎形灶由甑、釜、灶体和烟囱四部分组成,通高达1.60米、形体巨大、灶体铸成大虎头,背上有灶眼,上置釜、釜上安甑,釜、甑均饰一周蟠螭纹。灶体尾部有出烟的烟道眼,上接四节烟筒,全部采用分体组装,使用和移动十分方便,在灶体内满挂小刺,用于搪炉挂泥用。2590年前的祖先已经懂得在炉内搪泥保温,保护烧煮热力,提高烧煮的效能。

在晋式青铜器花纹中除延续商周时期传统的动物造型艺术题材外,同时也因长久居住在戎狄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极容易与北方各族相接触,互相影响,相互借鉴,吸取他人之长,发展丰富了晋式铜器花纹和形体,出现大量的以动物为原型的写实动物形态。在青铜礼器中有仿照动物形态的鸟尊、匏壶,或用虎、猪、鹤、犀牛、牛等作青铜器装饰性附件,例如,虎头匏、匏壶鸟尊的虎形提梁,猪纽、犀牛纽,牛纽的盖鼎。铜器花纹中更是大量配伍龙、凤、鸟、牛、虎等原形,或者由虎、龙、鸟、蛇演变来的蟠螭纹和蟠虺纹。

这些常见于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用具,和生动活泼的动物造型,都具有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同北方游牧民族青铜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影响是深刻的。在赵卿墓中出土,无疑是赵氏家族长期与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打仗及相邻里,极容易与北方各族文化发生相互影响和借鉴,吸取他人之长,发展丰富了晋式文化的内涵,出现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具和写实动物原形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晋国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相互间影响广泛,互相取长补短,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清楚的,这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特点的青铜器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展,特别是晋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在先秦时期逐步由南向北推移,富有兴味。

山西考古发掘中多年积累的资料,从出土文物、文化习俗和墓葬情况分析,情况是很清楚的。从新石器时代、经商代到春秋早期,两者之间的分界是以山西中部临汾盆地和晋中盆地、两盆地之间的霍太山为界,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北部龙山、早商遗址中游邀、白燕、峪道河等出土的陶鬲体基本成方形,卷唇、高领高袋足鼎,大型单、双耳直口圜肩平底罐和大袋足鬲,最具有特点是三足瓮,三足瓮早期基本上是山西及其临近地区,特别是晋中以北特有的陶器类型。商代晚期吕梁、晋中、忻州、黄河沿岸、汾河流域的石楼类型青铜器,既有殷墟类型的鼎、爵、觚、觶、尊等铜礼器,还有一大批具有特色的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很深的青铜器,带有铃铛的豆、觚、双球铃车马器,羊头或鹿头青铜小刀,动物图案的提梁卣、深腹鼎、鸛卣、金耳环等,夫妻二人同穴合葬墓等。而霍山以南主要是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陶寺文化和与二里头相近的东下冯文化类型,到春秋中叶以后,明显地北移,分野以晋中盆地与忻定盆地之间石岭关为界。滹沱河流域一带的代县沙洼村、原平刘庄、陈家岗、王北尧、朔州井坪(平鲁县城)、浑源李峪等地,铜器中多见扁长方形的高圈足豆形器,体略成方形,上为折沿方唇短颈深腹甗,下为敛口方唇短

颈蹄足鬲,单耳壶,装饰品有金盘丝,绿松石串珠,普遍应用石椁或积石墓葬。同河北中山国,新乐中同村,行唐李家村,庙上村,唐县北城子钓鱼台等地情况相似,都有发现。原平刘庄出土的尖嘴形鹤嘴斧,同内蒙桃红巴拉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鹤嘴斧完全相同。岢岚芦子河出土的管釜斧,长方形斧刃,管釜面上下有凸棱,中间各饰一个双圈纹。后侧与刃相对处有一个小圆柱,柱根有一孔,可铆钉。这种斧或称戚,在商代石楼青铜器中多见,商代以后在山西中、南部已经不见了,而于河北青龙抄道沟,昌平白浮,甘肃灵台百草坡,内蒙古南山根 101 号墓都有,极为相似。^③这与晋悼公中兴霸业,向北推进,赵卿长期活动在晋中有着直接关系。到汉代匈奴族文化遗存在山西主要位于朔州以北神头附近,即汉马邑城以北,见 1984 年朔州东官井村发现的匈奴鲜卑遗物。^④

三

山西地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和南方发达的中原文化的交汇地,置身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间的山西晋国文化,由于受到两种文化的碰撞、冲击、融合过程的影响,推波助澜,促进了晋和三晋文化大踏步向前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山西这块有着悠久历史的黄土地,历来就是古代民族聚居地。据史籍记载,长期居住着许多戎狄部落。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其弟虞来到古唐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⑤这里是狄族最集中地区,《国语·晋语》:“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于王室”。都说明晋与古代少数民族戎狄杂居在一起。因此,叔虞来到晋地以后,针对与戎狄部落为邻,和已经很发达的夏族文化,夏王朝多年的统治,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就是采用夏王朝治理华夏地区的制度和本地戎狄的法度来治理晋国,取得了重大成效。为晋国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展晋国政治经济,发挥了拱卫周王室的“藩屏”作用。晋长时期同相邻的戎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和

睦相处的关系,通过通婚、会盟、任用、臣属和职贡等手段,笼络周边的戎狄各族,有时也采用征伐、战争手段平息他们的反叛,以又打又拉的手段,笼络周边的戎狄各族,稳定有序地发展了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为晋国经济开发,国势的强盛,晋悼公中兴霸业,九合诸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与晋相杂居的戎狄诸族,交往中接受了高度发展的晋国文化,发展本族文化,逐步融合于华夏文化之中。戎狄各族到战国中晚期,逐渐同晋族完全融合在华夏文化之中,史籍中不复有他们活动的记载。晋国的统治者同外族交往中,不断地吸取草原游牧民族的先进文化,变为己用。特别是在长时期交往和战争中认识到骑射技术在丘陵和山地作战的重要性,有着许多比步兵、车战优越之处;三晋时期位于晋国北部疆域的赵国首当其冲,同北方草原游牧部族楼烦、林胡、东胡的经济来往、战争拼杀中,认识了骑马作战的优越性,吸取其成功的骑射经验,逐步创建自己的骑兵,组织训练基地,到赵武灵王时期,逐步成熟。赵武灵王采用说服和强制国人军民,易服改制,适应骑马作战的新方针,这就是三晋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方针。顺乎历史发展趋势,赵武灵王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是多年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斗争中得出的教训,要发展赵国政治

经济必然采取的步骤。也是处于夹缝中的三晋文化学习、吸取外族文明的结果,赵武灵王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从此,赵国战斗力大大增强。灭中山,占据林胡、楼烦地区,向北大大扩张土地,把疆域一直推到今日内蒙中部。赵国成为三晋中土地最大,占地最广,包含民族最多的大国,为中华文明发展壮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位于山西地区的晋和三晋,以及后代汉族文明,兼容并蓄,善于吸取他人之长为己有,发展壮大。在友好相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文化交流,既发展了晋国文化,也提高了周边各族文化的发展,给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起着大熔炉作用,加速了各族之间融合过程,为创建我国具有巨大凝聚力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注:

- ① 田广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148页。
- ② 田广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44页。
- ③ 田广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51页。
- ④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1),140页。
- ⑤ 《史记·晋世家》,1635页。

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殷周使用青铜农具之考察

王克林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①”。何谓生产力?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表明生产工具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尺度。所以,人们要认识社会的发展就要了解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考察生产工具的发展与演变,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认识已经消亡的古代社会面貌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研究我国殷周时期的青铜工具特别是其中的农具,并由此去揭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便是衡量殷周社会或经济形态的指示器。从而对判明殷周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性质,以及中国古史的分期,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我国殷周时期,是否使用或大量使用过青铜农具?这一重要而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以往在历史、考古学界,就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说:殷周没有使用过青铜农具,在春秋时期也没有使用过,不但没有使用过甚至在古代中国就根本未曾有过青铜农具这一历史阶段^②。但是也有不少同志认为,殷周是使用了青铜农具的^③,有的同志还说其时不但使用了而且还是“大量”的^④。认识到我国古代农具的发展,并不像前面那些同志所说,是由木、石器直接发展到铁质的过程,其间是有过一个青铜农具的历史阶段。对此,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因为弄清了这个问题,不单是如有的同志所说:“就能具体了解到殷周时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从而有助于对该时代社会性质的判定”^⑤。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对青铜时代的认识,即什么是青铜时代,它的标准是什么?进而对该时代的划分是以青铜容器,还是以其生

产工具为划分时代的标准?有关青铜时代的划分,我们说青铜时代之作为一个时代,它之区别于以前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其基本的标志或时代的特征,就在于使用了与生产相联系的青铜工具为标准的。而有关我国古代使用青铜农具的问题,我们根据考古资料,看其发展规律,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大量的,而是有个过渡或发展过程,在形制和数量上是循序渐进地,由少到多,由一般小型工具发展到有了一定分工的青铜农具。嗣后,才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便从考古学的角度,参照一些历史文献,对此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供大家讨论。

在铁器时代以前,我国殷周时期是使用了青铜农具的,而且还远不以此为始,若求本探源可以追溯到商代早期,但并不像唐兰先生所说:“是从青铜时代一开始就开始”^⑥,因为就中国青铜器起源的时代,以黄河流域中下游而言,考古资料表明,目前最早的遗存是河南登封告成^⑦,临汝煤山^⑧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等处龙山文化中^⑨,出土很少且碎破不识器形的铜片和一些炼铜坩锅残片及铜渣遗物。而真正的青铜器是偃师二里头^⑩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的(夏)文化中^⑪,出土一些小型工具的铜凿和铜兵器。而较大的青铜容器,也仅在二里头文化阶段后期为数是有限的铜爵,说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或铸造,一开始并不是用于生活上的大型如鼎等容器,而是为生产相联系的一